

开拓创新，成就辉煌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70年

史金波 黄润华

[提要] 本文系统梳理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一，记述了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的成立并开始建立学科体系及全面、深入开展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第二，概述了中国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成立和开展民族古籍普查，促进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近十多年来，又开展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评审包括民族文字在内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启动西藏、新疆古籍保护专项工作，进一步推动民族文字古籍的保护和研究；第三，列举了民族古文字研究的大量创新性成果，以彰显中国民族古文字的研究取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第四，希望进一步做好民族古籍普查，深入开展民族古籍研究，夯实民族古籍的定级工作，使民族文字古籍“活起来”，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 中国民族文字 古文字 古籍 整理与研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在中国境内，除各民族通用汉文外，很多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制并使用过30多种文字，并形成了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数量巨大的民族古籍，成为中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古籍文献推动了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和交流，为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民族古文字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虽有所开展，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一些古代遗址和甘肃敦煌石室陆续发现了大量古文字文献，其中包括佉卢文、焉耆一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古藏文等。随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又发现了大批西夏文文献。这些民族文字文献多流失国外，先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后来，国内专家也开展了研究。当时，陈寅恪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力涉猎多种民族古代语言文字，如吐火罗文、突厥文、回鹘文、古藏文、西夏文、蒙古文、满文等。

当时在陈寅恪、王国维、罗振玉、赵元任等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些年轻学者投身研习中国民族古文字，成绩斐然。如季羨林对焉耆一龟兹文的研究，韩儒林、岑仲勉对突厥文的研究，冯家昇对回鹘文的研究，罗福苾、罗福成、王静如对西夏文的研究，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焯对契丹文的研究，罗常培、韩儒林、陆志韦对八思巴文的研究，罗福成、金光平、金启琮对女真文的研究，金梁、李德启对满文的研究，于道泉对古藏文的研究，杨成志、丁文江、马学良对彝文的研究，石钟健对白文的研究，方国瑜、傅懋勤对东巴文的研究，等等。他们开创了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的先河，为后来民族古文字文献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古文字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在国家的大力组织下，民族工作蓬勃发展，民族古文字研究逐步复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蓬勃开展起来，并达到新时代的繁荣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进行民族识别。1956 年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参加调查的专家学者最多时达到千人以上。当时的调查，除了重点调查各民族的社会、历史、语言外，还调查了古今民族文字的使用情况，同时还搜集了一批民族文字古籍文献。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的古藏文、老傣文、老彝文、察合台文、水书等民族文字文献古籍就是那时搜集的。

民族古文字研究向来是“冷门”学科，问津者少。但 20 世纪 50-60 年代还是有一些关于民族古文字研究的论著。如夏鼐的《和阗马钱考》（《文物》1962 年第 Z2 期），韩儒林的《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等。20 世纪 60-70 年代，一些民族古文字，如西夏文、回鹘文等的研究逐步开展起来。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古文字研究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开展的。

二 成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建立学科体系

“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从事民族古文字研究的老专家恢复业务，中青年学者开始活跃，研究民族古文字的一些论文相继发表。在学术团体相继成立的氛围下，研究民族古文字的中青年学者主动与老专家联系，酝酿成立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79 年在天津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季羨林、翁独健等 16 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倡议重视和加强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建议成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在民族古文字研究基础薄弱、专家不多、各文种不易沟通的情况下，这是一项解放思想和具有开拓性的倡议。

（一）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的成立

1980 年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召开专家座谈会，季羨林、翁独健、陈述、金克木、马学良、李森、熊德基等 20 多位老专家和一些中青年学者与会，畅谈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以及对发展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现实意义，强调成立研究会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组织、团结民族古文字研究专家形成合力的重要性，并决定 1980 年 8 月召开研究会成立大会。随后照那斯图、史金波于 1980 年 7 月到河北省承德市，与承德市文物局等单位联系，筹备召开研究会成立大会事宜。

1980 年 8 月 1 日，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在承德避暑山庄召开。当时老中青专家学者们的热情都很高，与会者近百人，其中有翁独健、陈述、金克木、马学良、李森、熊德基、金启琮、闫万章、王均、陈士林、张克强等老专家，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出版社等部门的领导江平、马寅、牙含章、张养吾、李鸿范等热情出席。

会议的主题是研讨民族古文字研究的意义和介绍各文种概况。那次会议是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专家学者的首次大聚会、大交流，是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具有开创性的里程碑，是民族古文字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提出来的重要标志。它和汉文古文字的研究成为中国古文字研究

领域的双翼，使中国古文字这门学科更为丰富，更为完善。会议确定，研究会是从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的专业和业余人员的民间学术团体，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会议推举包尔汉、季羨林为名誉会长，选举傅懋勳为会长。

（二）举办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

研究会成立后的第一件重大学术活动是1980年10月举办的“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

在研究会成立大会前，筹备组通知与会专家学者尽可能带一些民族古文字文献原件、拓本或样品，以便向代表展示、交流。会议期间因陋就简，借用避暑山庄烟雨楼布置了两层展厅，展出了多种民族古文字文献，受到与会者的好评，由此萌生了组织大型民族古文字展览的设想。当时研究会在既无资金，又无展品，也无办展经验的情况下，积极拓展思路，解放思想，白手起家，闯出了举办大型展览的新路。在国家民委文化司和民族文化宫的支持下，解决了资金、展览场地问题，在全国各有关部门的热情协助下，解决了展品问题。从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等国家级文博机构到边疆民族地区的文物单位都无偿提供了珍贵展品。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1980年10月1日，由国家民委文化司、研究会和民族文化宫联合举办的大型“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在民族文化宫拉开帷幕。研究会负责展览会的全部专业工作。展览会用近千件展品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民族古文字的概况，展示了丰富的文献，宣传了开展研究的重要意义。展览会展出了包括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古藏文、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西夏文、老傣文、老彝文、东巴文、哥巴文、契丹文、女真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满文等近20种文字的大量展品，其中很多重要文物和文献是第一次公开展出。

为期一个月的展览，参观者达一万二千余人次。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对这次展览很重视，乌兰夫、赛福鼎·艾则孜、阿沛·阿旺晋美、万里、邓力群等1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了展览，有的领导还询问了这一学科的情况，提出了希望。展览会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少知名专家热情参观展览。广大参观者参观了这一别开生面的展览后，感到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有的参观者还在留言簿上写下留言：魅力无比，沁人心肺，虽成静物，满室生辉。展览对民族参观者有更大的吸引力。国外人士对展览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荷兰等20多个国家的外宾和联合国的有关官员相继前来参观。新闻界对这次展览也很重视。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新华社播发了消息，《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也作了报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多种外语用30分钟时间向国外听众作了介绍。

这次展览第一次向国内外受众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的概况，宣传了民族古文字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使国内外了解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促进了学术交流，为增进民族团结、繁荣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贡献。

（三）有组织地开展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

研究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民族古文字研究组织工作，在不同阶段提出了民族古文字研究的重点，在加强队伍的组织建设、促进会员之间的学术交流、编辑出版研究成果和学术资料、开展古籍整理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至今研究会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性的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还举办过多次地区性和专题性的中小型学术研讨会。很多会员在文献资料整理和专题研究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研究会编辑出版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傅懋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一次全面介绍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及相关的300多种文献，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随后

研究会又编辑出版了多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论文集，还刊印了一些有关的图书和资料。

研究会成立后，有力地促进了各文种的研究并形成了开拓、务实、进取、团结的优良传统，民族古文字研究呈现出全面发展的良好态势。2010 年研究会成立 20 周年之际，在承德召开大会，回顾、总结了研究会 20 年来走过的历程，展望了未来发展的方向。2020 年喜迎研究会成立 40 周年，计划在银川召开学术会议，进行研讨和总结。

三 成立全国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促进民族古籍整理研究

1981 年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发[1981]37 号）重要文件，同年 12 月，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任组长。此后，中国古籍的整理工作出现了更繁荣局面。1982 年 1 月 20 日，李一氓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论古籍和古籍整理》。时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润华致信李一氓，说明民族古籍的重要性。后来，李一氓在《人民日报》再次撰文谈古籍整理工作，专门论述了民族古籍，明确指出民族古籍是中国古籍的一部分。后来才知道李一氓对黄润华的信很重视，特地批转到国家民委。当时国家民委的领导也关注此事，并多方征询意见。

在研究会的促进下，新的民族古文字种类增加、古籍文献不断得到发掘，影响不断扩大，对民族文字古籍进行全面整理、出版、研究的呼声越来越高。1983 年 6 月，国家民委在北京卧佛寺召开了民族古籍整理座谈会，由副主任伍精华主持，副主任黄光学、洛布桑和国家教委副主任周林出席并讲话，李一氓亲临会议讲话。领导们的讲话在与会代表中产生了深刻影响，也给后来的民族古籍整理工作指明了方向。史金波、黄润华代表研究会出席了座谈会。

（一）成立全国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开展民族古籍整理工作

1984 年 4 月 19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国办发[1984]30 号）。1984 年 7 月，在国务院设立由国家民委牵头、国家教委等多个部委共同参与的全国性民族古籍工作机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民族古籍工作由中央政府主管民族事务的部门归口领导，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整理、翻译、出版、研究工作全面展开，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走上了更为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成立“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出版办公室”，作为当地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下属机构，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1985 年，第一次全国民族古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此后多次召开全国民族古籍工作会议，持续推动民族古籍的整理、规划、出版和研究。1989 年，“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更名为“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负责组织、协调、联络和指导抢救、搜集、整理、出版民族古籍工作，起草有关政策和法规草案，组织制定重点项目及全国性重大课题的规划与实施，指导人才培养培训和民族古籍资料、信息管理工作。

（二）对民族古籍进行普查，编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

“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在各地区进行普查、抢救、搜集、保护民族古籍，得到了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的拥护，提高了各民族群众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民族团结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96 年，“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策划编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全面汇总民族古籍普查工作取得的成果。这是一项抢救、整理和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举措。

1997年正式立项,1998年付诸实施,2006年8月这一项目正式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是中国第一部民族古籍解题书目套书,总体设计约60卷,110册,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至2018年已出版了36个民族的古籍总目提要。此项工作充实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内容,为了解多民族文化形式的源流、揭示社会文化发展的轨迹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为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提供了新视角。

(三) 壮大民族古籍工作队伍,召开中国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吸纳并组织了一批民族古籍方面的专家,民族古籍整理、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有条不紊地开展本地区的民族古籍整理工作。30多年来,各民族古籍研究著述以及综合、系统研究民族古籍的论著不断出版。全国和各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机构,多次召开工作会议和学术会议。2010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发起,与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西南民族大学、研究会共同举办了“中国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迄今已连续举办了9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民族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四 开展全国古籍保护工作,推动民族文字古籍的保护和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保存古籍最多的国家,历来有保护古籍的优良传统。2007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达《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对全国开展古籍保护工作做了统一部署。包括民族文字古籍在内的中国古籍保护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 全面推动古籍保护工作,民族文字古籍列入普查范围

古籍保护工作在国务院领导下,由10个部委组成全国古籍保护委员会,以文化部牵头开展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建立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并成立了全国古籍保护中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了地方上的古籍保护中心。2007年7月,文化部召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了会议。同年9月,文化部派出多个督导组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工作检查、督导,其中包括民族地区。

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加强对古籍的管理,以便国家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古籍保护工作。这是第一次将汉文古籍和民族文字古籍同时进行的全国性的大规模普查,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件大事。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统一部署下,收藏民族文字古籍的地方和相关机构有序地开展了民族文字古籍的普查。

为保证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中心成立普查队,组织培训工作。过去,民族地区古籍鉴定和保护工作相对滞后,古籍工作者十分缺乏。为配合这次古籍普查,全国古籍保护中心在多地举办了多次民族古籍普查培训班和民族文字古籍鉴定与保护培训班。10多年来,举办了民族古籍普查鉴定班、培训班10期,培训490多人次;举办古籍、拓片等鉴定培训班16期,培训1000多人次。

(二) 评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民族文字珍贵古籍琳琅满目

2007年11月正式开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工作。这是中国为建立完备的珍贵古籍档案、确保珍贵古籍的安全、推动古籍保护工作、提高公民的古籍保护意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而由文化部拟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的名录,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其中包括民族文字古籍。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分为5个组,其中“民族语文文献组”负责民族文字古籍

的评审。评审委员会由史金波、黄润华、王尧、张公瑾、梁庭望、才让太、达力扎布、买提·热依木、张铁山、黄维忠、吴元丰、黄建明、朱崇先、吴贵飏、东主才让、先巴、赵世红、戴红亮、萨仁高娃、全桂花和庄秀芬、郭晶晶等组成。

从 2008 年开始，已进行多次评审。先由各地申报，经地方古籍保护中心审核，再报全国古籍保护中心分专家组评审。每次评审工作严格按标准要求，反复讨论，工作往往持续一两个月。至 2016 年连续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已以国务院名义发布，共含 12274 种珍贵古籍，其中每一批都有若干种民族文字珍贵古籍。这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陆续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古籍保护中心整理、编辑，并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为题名，由詹福瑞、周和平任主编，李致忠任常务主编，史金波、朱凤瀚任副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分批出版，目前已出版五批（第一批 8 册，2008；第二批 10 册，2010；第三批 8 册，2012；第四批 6 册，2014；第五批 6 册，2016）。每一批的最后一册是民族文字珍贵古籍，共包含民族文字珍贵古籍 1000 种。2019 年，又启动了第六批全国珍贵古籍评审工作。将汉文和民族文字珍贵古籍同时公布，这是国家弘扬民族文化的有力举措，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件大事。

已出版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包含多种民族文字古籍，有焉耆—龟兹文、于阗文、古藏文、回鹘文、西夏文、回鹘式蒙古文、察合台文、方块白文、老彝文、满文、东巴文、老傣文、水书、古壮文、古布依文及多文种合璧的古籍，可谓精品纷呈，流光溢彩，件件锦绣，展示了民族文字古籍的精髓，彰显了中国多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成书于 5-6 世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剧本的焉耆—龟兹文古籍《弥勒会见记》（新疆博物馆藏）；有千余年历史的于阗文古籍《陀罗尼》（国家图书馆藏）；编于 9 世纪、认为失传久已的古藏文古籍《旁唐目录》（西藏博物馆藏）；元大都刊印的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的因明学著作古藏文古籍《量理宝藏论释》（西藏博物馆藏）；北宋时期的回鹘文古籍《弥勒会见记》（新疆博物馆藏）；唯一存世的形象地反映译场译经的图画古籍《西夏译经图》（国家图书馆藏）；近年在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寺发现、认为失传已久的历史文献回鹘式蒙古文古籍《蒙古秘史》（西藏札达县托林寺藏）；15 世纪维吾尔族大诗人、思想家艾里希尔·纳瓦依所著诗集察合台文古籍《纳瓦依诗集》（新疆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朱批稿本满文古籍《几何原本》（内蒙古图书馆藏）；清朝历代皇室的满文古籍《实录》《圣训》《玉蝶》；以图文并茂形式记述彝族古代社会的老彝文古籍《百乐书》（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藏）；以特殊工艺制成纸张、用金银粉写成的贝叶经老傣文古籍《羯磨说》（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少数民族研究所藏）；以象形文字记录、内容和版本皆具有珍贵艺术价值的东巴文古籍《东巴舞谱》（云南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藏）；堪称水族社会百科全书的水书古籍《万年经镜》（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档案局藏）；体例和形式独特、壮族人民学习汉字的工具书古壮文古籍《三千书》（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藏）。

此外，还有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字合璧的多文种古籍，包括汉文和民族文字合璧的古籍和多种民族文字合璧的古籍。多文种合璧古籍鲜明地反映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凸显出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交往、交流、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有：汉文和民族文字对照、有 31 种译语的《会同四译馆译语》；清朝 5 种民族文字合璧标音词典《满蒙藏嘉戎维语五体字书》（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清代满文、蒙古文、汉文、藏文 4 种文字合编的《四体合璧清文鉴》和增加维吾尔文的《五体清文鉴》以及由六种文字合璧的《西域同文志》；清刻本《书法集》（西藏罗布林卡管理处藏）汇聚汉、印度、新疆、克什米尔、尼泊尔、藏、蒙古

等多文书法及有关藏传佛教戒律方面的图解，对研究当时各民族的文字有很高的价值。

（三）启动西藏、新疆古籍保护专项工作

国家对民族古籍保护十分重视，采取了有效的特殊照顾措施。为进一步推动西藏古籍保护，2009年11月6日，文化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民委、新闻出版总署、宗教局、文物局、中医药局八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支持西藏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文社文发[2009]44号），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了藏文古籍保护工作小组，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经费中设立了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专项经费。八部委组成的西藏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以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等的古籍保护专家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西藏古籍保护工作座谈会，西藏古籍保护工程全面启动。

在西藏古籍保护工作这项工程顺利进行并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八部委于2011年1月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文社文发[2011]3号），启动了新疆古籍保护专项工作，使新疆的古籍保护工作也纳入到了国家重点专项扶持的快车道。

对民族古籍十分丰富的两个民族自治区给予特殊专项扶持政策，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民族文化建设创新工程，对推动民族文字古籍的保护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四）制定《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标准

在2007年8月1日文化部“关于印发《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方案》等文件的通知”（文社图发[2007]31号）中明确规定“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标准由国家民委组织制定并颁布实施”。2008年1月14日国家民委印发《关于编制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标准的通知》（民委发[2008]253号），规定由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牵头编制。

在进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过程中，民族文字古籍评审组根据工作实际需要，于2008年12月在参考汉文古籍定级标准的基础上，根据民族文字古籍的多文种、多类型的特点，专门研究制定了《民族文字珍贵古籍入选标准》，以便于准确操作民族文字珍贵古籍的评审。这实际上是初步制定了民族古籍中一、二级的标准。

2009年4月在民族文化宫召开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定级标准专家论证会”，杨长虹、史金波、吴贵飏、艾合买提·买买提、李晓东、张志清、董文良、李东生、杨崇清、宝音吉戈拉、崔光弼、先巴、黄润华、王尧、张公瑾、梁庭望、黄建明、达力扎布、才让太、朱崇先、黄有福、吴元丰、陈红彦等参与起草“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定级标准”。经过反复讨论、修改，2012年完成定级标准草案，其间多次到民族地区召开调研座谈会和论证会，还到很多相关地区进行试验划分，效果良好。最后形成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于2018年9月17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19年4月1日实施。这一重要定级标准的发布对指导中国民族古籍定级、保护工作更加科学化、法制化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中的民族古籍

2002年，国家正式立项建设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华再造善本工程”，这是由国家投入巨资，财政部、文化部共同主持，国家图书馆具体承办，集中国内一批顶尖学者共同参与，通过大规模的复制出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古籍善本的一项系统文化工程，使善本古籍化身千万，为学界所应用，为大众所共享。“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分为《唐宋编》《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编》，每编下以经、史、子、集、丛编次。

工程分为两期，第二期有民族文字古籍30多种入选，包括焉耆一龟兹文《弥勒会见记》、

于阗文《陀罗尼》、回鹘文《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方块白文《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经抄》、回鹘式蒙古文《孝经》《阿勒坦汗传》、古藏文《四部医典》、察合台文《纳瓦依诗集》、满文《御制盛京赋》、满汉蒙文《三合便览》、老彝文《劝善经》、东巴文《创世经》、老傣文《羯磨说》、古壮文《么破塘》、水书《庚甲》等。这些均是民族文字古籍精品，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也反映出各民族文字古籍制作的精湛工艺。

五 攻坚克难，民族古文字文献古籍研究的新进展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得到空前发展，两三代专家薪火相传，成果累累，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重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综合、系统研究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论著不断出版，如傅懋勳主编的《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吴肃民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概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张公瑾主编的《民族古文献概览》（民族出版社，1997），魏忠的《中国的多种民族文字及文献》（民族出版社，2004），史金波、黄润华的《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探幽》（中华书局，2008），张公瑾名誉主编，黄建明、张铁山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珍稀典籍汇编》（28 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等等。

各种民族古文字的研究也有大量成果问世。扼要分列如下：

1. 佉卢文，有马雍的《新疆所出佉卢文书的断代问题》（《文史》第 7 辑，1979）、《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1984），林梅村的《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文物出版社，1988）。

2. 焉耆一龟兹文，有季羨林的《吐火罗文 A 中的三十二相》（《民族语文》1982 年 4 期）、《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季羨林文集》第十一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3. 古藏文，有王尧的《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王尧、陈践的《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1992]），王尧主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民族出版社，1999）。对传世古藏文史书的整理、译注的有王沂暖译的《西藏王统记》（商务印书馆，1949），郭和卿译的《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1983）、《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布顿佛教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 年），黄颢译的《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刘立千译的《米拉日巴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土观宗派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陈庆英译的《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吴均等译的《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陈庆英、高禾福译注的《萨迦世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黄颢、周润年译注的《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此外，还有一些记载重要家族、寺庙和历史人物的古藏文史书也被整理出版，如《朗氏家族史》《塔尔寺志》《颇罗鼐传》。

4. 回鹘文，有冯家昇的《回鹘文契约二种》（《文物》1960 年第 6 期）、《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三种》（《考古学报》1958 年第 2 期），胡振华、黄润华的《高昌馆课》（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耿世民的《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李经纬的《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牛汝极的《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杨富学的《回鹘文献与

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 2003), 刘戈的《回鹘文契约文书初探》(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0)、《回鹘文买卖契约译注》(中华书局, 2006)。

5. 西夏文, 大型文献丛书有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的《俄藏黑水城文献》(1-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2019),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纂的《英藏黑水城文献》(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2010)。文献整理和研究成果有史金波、白滨、黄振华的《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李范文的《同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6), 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的《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 陈炳应的《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5),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的《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5),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 2000), 聂鸿音的《德行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2), 克恰诺夫、聂鸿音的《〈孔子和坛记〉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9), 孙伯君的《西夏文献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梁继红的《武威出土西夏文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梁松涛的《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史金波的《西夏经济文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彭向前的《俄藏西夏历日文献整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此外, 还有新见文献成果, 如史金波的《凉州会盟与西夏藏传佛教——兼释新见西夏文〈大白伞盖陀罗尼经〉发愿文残叶》(《中国藏学》2016年2期)。

6. 契丹文, 有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的《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即实的《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年), 《谜田耕耘——契丹小字解读续》(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2), 刘凤翥的《契丹文字研究类编》(4册)(中华书局, 2014), 清格尔泰、吴英喆、吉如何的《契丹小字再研究》(3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17)。

7. 女真文, 有金光平、金启琮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0), 道尔吉、和希格的《女真文〈大金得胜陀颂〉碑校勘释读》(《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胡振华、黄润华的《高昌馆杂字》(民族出版社, 1984), 金启琮编著的《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 1984), 孙伯君的《金代女真语》(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4), 刘凤翥等编著的《女真译语校补和女真字典》(中西书局, 2019)。

8. 回鹘式蒙古文, 有道布的《回鹘式蒙古文献汇编》(民族出版社, 1982)。回鹘式蒙古文译注和研究的, 有谢再善译的《蒙古秘史》(中华书局, 1957), 留金锁校注的《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 朱风、贾敬颜译的《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格什克巴图译、策·阿拉腾松布尔、苏雅拉达来注释、孟克宝音拉丁注音的《格什克巴图译元朝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 乌兰的《〈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0)、《元朝秘史》(校勘本)(中华书局, 2012), 萨仁高娃的《西藏阿里地区发现蒙古文散叶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9. 八思巴字, 有罗常培、蔡美彪的《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科学出版社, 1959), 照那斯图、杨耐思的《蒙古字韵校本》(民族出版社, 1987), 照那斯图的《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I 研究文集, 1990; II 文献汇集, 1991), 照那斯图的《新编元代八思巴字百家姓》(文物出版社, 2003)。

10. 察合台文，有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的《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王治来译的《〈拉失德史〉译文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安宁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苗普生的《清代察合台文文献译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

11. 满文，有富丽的《世界满文目录》（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印，198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的《盛京刑部原档（清太宗崇德三年至崇德四年）》（群众出版社，1985），关嘉录、佟永功、关照宏的《天聪九年档》（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译注的《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冯明珠主编的《满文老档》（10册）（台北故宫博物院，2005），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满文编辑部的《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全20卷）（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黄润华、屈六生的《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黄润华主编的《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12. 老彝文，有冯元蔚的《勒俄特依》（四川民族出版社，彝文本，1982；汉文本，1986），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罗国义、陈英译，马学良审订的《宇宙人文论》（民族出版社，1984），马学良、罗国义的《增订彝文丛刻》（3册）（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1987），马学良、张兴等的《彝文〈劝善经〉译注》（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杨风江译注的《彝族氏族部落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的《彝文〈指路经〉译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黄建明的《彝族古籍文献概要》（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的《西南彝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彝族源流》（4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王明贵、王显编译的《彝族源流》（民族出版社，2005），王运权、王世举的《西南彝志》（13册26卷）（贵州民族出版社，2015）。

13. 东巴文，有李霖灿的《么些经典译注九种》（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8），和志武的《东巴经典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卜金荣主编的《纳西东巴文化要籍及传承概览》（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傅懋勤的《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

14. 古壮字，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编的《古壮字字典》（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梁庭望的《古壮字文献选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15. 水书，有潘朝霖、韦宗林主编的《中国水族文化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以上列举的仅是民族古文字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其中既有对各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的综合、宏观的研究，也有对各民族文字及其文献的深入解读；既有对文献整理、翻译的基础性资料，也有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的创新成果；既有个人深入钻研的著述，也有集体攻关的集束性丛书。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在诸多领域创造了很多高水平、原创性成果，对世界民族文字研究做出了显著贡献，取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六 民族文字古籍研究前景灿烂，必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更大贡献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民族文字古籍研究前景灿烂，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要不断加强人才培养和建设外，我们有如下一些建议，希望能引起重视。

（一）进一步做好民族古籍普查工作

中国民族文字古籍数量多，分布广，远远超出了人们以往的认识。如西藏布达拉宫的五

座书库的藏文古籍十分丰富，尚待进一步整理。新疆在古籍普查中创造了志愿者与专家搭配的模式，发现了很多新的古籍。很多民族文字古籍，藏于寺庙、民间。古籍普查要下沉到基层。今后的工作任重道远，一定要善始善终地做好。

（二）进一步开展民族古籍的研究工作

随着民族古籍普查工作的展开，对这些古籍的认知和鉴定水平却十分滞后，影响了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其中至少有两个方面特别需要重视。

1. 重点引导、加强对民族古籍版本的研究。与汉文古籍版本研究相比，目前民族古籍版本研究刚刚起步，还较少从版本鉴定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这影响了对民族古籍认知和鉴定，解决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2. 加强重点民族古籍的内容、价值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做好出版及数字化工作。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一是将民族古籍直接影印，使学术界尽快见到原始资料。但因文字所隔，受众面很小。二是将民族古籍译成汉文，与原书一起出版，这种著述影响较大。要想让民族古籍里的字活起来，发挥其最大的作用，还是要努力将有价值的古籍译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进行深入研究，发掘其价值，让更多的人共享优秀文化遗产。

（三）进一步夯实民族古籍的定级工作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已经颁布施行，但民族古籍文种众多，形式各异，会产生新的问题，需要不断研究总结，使定级标准不断完善。一是有针对性地举办培训班，二是组织专家小组对重要藏书单位的民族古籍进行鉴定、评级。专家小组除本语种的专家外，还要有版本、历史、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专家，以便从多维度来审视，从而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四）进一步加强民族文字古籍的文字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作为一个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6、2017年两次将包括少数民族文字在内的学科列为“特殊学科”并重点支持。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冷门“绝学”项目，在立项的20多个项目中，敦煌学、藏学、西夏学、蒙古学、民族语言文字学、古文字学、古籍和特色文献整理研究等都涉及民族古文字研究，体现了国家对民族古文字研究的高度重视。但是，民族文字古籍的文字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尚待加强，要特别加强对新发现民族古文字的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的研究，加强民族文字古籍的语言学方法论的研究，加强表音民族文字的历时语言学研究，揭示文字所记录的语言的古今演变脉络和规律，更好地为现实的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服务。

（五）进一步认识民族古文字及其古籍文献研究的现实意义

民族文字古籍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宝库的璀璨明珠，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团结进步、和谐共处、交流交往交融、维护祖国统一的积极思想内涵。通过整理、翻译、研究民族文字古籍，能充分揭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这些积极思想，对巩固各民族的国家意识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编纂了满文古籍《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功绩表传》，清嘉庆七年（1802）以汉文、满文、蒙古文刊印。这部重要文献对研究清代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历史及清代各民族的密切关系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又如近年新见的西夏文古籍《大白伞盖陀罗尼经》反映的是蒙古王子阔端在西夏故地凉州接受藏传佛教，于1244年刻印藏文、西夏文、汉文佛经，后与西藏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达成“凉州会盟”，使西藏纳入元朝版图。这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进程重要事件的有力佐证，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的大量成果和显著进展，丰富了中国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知识，展示了各民族绚烂多姿的文化，增强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识，提升了各民族的文化自信。民族文字古籍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的蓬勃发展和辉煌成就，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国家的一项创举，不仅充分体现出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也促使中国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活起来”，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实际贡献。可以预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研究在新时代会有更加美好的前景，必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更新、更大的贡献。

Pioneering Endeavors, Innovative Spirit and Brilliant Achievements: A Review of Ethnic Paleographical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

SHI Jinbo and HUANG Runhua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past seventy years' studies on ethnic paleography in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rstly, it provides an account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National Paleography, which signals the establishment of ethnic paleography as an academic field and th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development of ethnic paleography in China. Secondly, it summariz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lanning Leadership Team for China's Ancient Ethnic Classics Collation and Publication, which launches the survey and promotes the col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ncient ethnic classics; moreover, in the past ten years or so, more endeavors and initiativ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earch of ancient ethnic classics, including unfolding nation-wide protection endeavors, conducting the review of the List of China's Precious Ancient Classics, and initiating a specified initiative in Tibet and Xinjiang. Thirdly, it enumerates a great number of innovative ethnic paleographical results, which shows that Chinese scholars increasingly have a voice in this field. Fourthly, it puts forward wishes for future endeavors or initiatives, including further improvement of classics survey, more in-depth researches, reinforcement of grading, and "making alive" ancient classics, in order t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promote excellent cultural heritag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reinforce ethnic solidarity and national unity, and to foster a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s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ethnic writing systems in China paleography ancient classics and books collation and research

(通信地址: 史金波 100081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黄润华 100081 中国国家图书馆)

【本文责编 李云兵】